

1971-1990 年中外賦學研究述評

目 錄

1971-1990 中外賦學研究.....	簡宗梧.....	I
篇目：		
壹、辭賦專著.....		1
貳、單篇論文.....		5
辭賦專著提要.....		1
AA0—通論.....		1
AA1—先秦.....		10
AA2—兩漢.....		12
AA3—魏晉南北朝.....		29
AA4—唐宋.....		39
AA5—明清.....		42
單篇論文提要.....		45
AB0—通論.....		45
AB1—先秦.....		103
AB2—兩漢.....		122
AB3—魏晉南北朝.....		277
AB4—唐宋.....		412
AB5—明清.....		478

1971-1990 中外賦學研究

簡宗梧

一 前言

在漢語文學發展的過程中，賦是體貌多變極具民族文化特色、領先開發語文藝術、影響極為深遠的文學體類。它晉身宮廷標誌著兩漢大帝國的文化風貌，也將想像融入敘述文學，把空間描繪的技巧發揮到極致的境地；隨著貴遊生態的改變，它在構辭造語與文學音律之美的講求，更發揮了先導的功能，成就了六朝文體。它多次變革以及與其他文類的相互滲透，產生質變，展現新姿；它還引領了詠物詩、山水詩的發展，哺育了唐代近體詩、變文，以及宋詞和小說，更與唐宋科學相結合，長期參與文官的養成與遴選，深深影響知識分子的表達、思辨與寫作。因此，無論就賦體的美學探索，或文體流變的文獻考察，乃至於與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互動關係的歷史分析，賦學研究都是重要的一環。

“五四”以後，由於受到西方各種新思考方式的激盪，促進賦學由評點式、資料性的考述，走向系統性、理論性的建構。或追溯辭賦的淵源，或探索辭賦的流變，或研究辭賦各階段的美學特徵，或分析賦家的個別風格。對辭賦史或做斷代的剖析，或做整體的研究，無不充滿了重新認識這一領域的探索精神。但也無可諱言，由於普羅文學的時尚，以及對賦的誤解，使文學史的研究者，對賦充滿負面的評價，所以措意於此的學者，有如鳳毛麟角。尤其中國大陸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改革開放之前，對賦的批評更為主觀而嚴苛，刻意加以打壓，因此賦學研究幾乎完全沈寂。

正如葉幼明在《辭賦通論》所剖析的，現代賦學研究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即：1919-1949，共 30 年，為新賦學的開創期；1950-1979，共 30 年，為新賦學的沉寂期；1980-1989，共 10 年，為新賦學的繁榮期。並以爲沉寂期：

這 30 年在我國當代史上是一個極左路線統治的時期。反映在對中國

文學史的研究上，則較普遍的是用一種庸俗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待傳統文學，認為文學只有反映勞動人民的窮困生活，只有反映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才是民主性的精華。其他題材則大都被斥為貴族文學，是封建糟粕而被排斥，被禁錮。於是研究者很是寥落。唐代古文運動興起，古文家就貶斥六朝賦。明清時期更提出“唐無賦”，“唐以後無賦”，研究唐以後辭賦的人本來就少。到這個時期，漢賦也被斥之為貴族文學、宮廷文學。因此，這個時期，除屈賦之外，對賦幾乎是異口同聲地一片排斥之聲。辭賦的研究就十分冷落。在大陸，除了 20 餘篇研究宋玉與漢賦的論文之外，專著一部也沒有。而且那些論文也是斥之者多，客觀評論者少。這是現當代辭賦研究的沉寂時期。

至於繁榮期，他則認為：

這 10 年是我國思想界大解放的 10 年，也是學術最繁榮的 10 年。賦學的發展也不例外。這 10 年，發表的賦學專著即有八九部，發表的單篇論文則有數百之多。這些專著與論文雖然主要還是漢賦研究，涉及魏晉六朝賦者已是很少，涉及唐以後賦者更是寥寥。但是其參加研究的人數之多，其涉及的研究範圍之廣，則是空前的。¹

何新文的《中國賦論史稿》也說：

自一九三九年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問世以後，國內賦學研究經過了一段長時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現復興的勢頭。²

其實這現象不限於中國大陸地區，只是在海外地區復興的勢頭，崛起的早一些，如臺灣地區這方面的研究，何新文雖然推許稱為“自成一片風華景象”³，其實在 1970 年以前也還是相當荒蕪的，即使 1970 年到 1990 年，其研究成果呈現，與詩詞曲的研究相較，仍少得可憐，與其他文類的研究，質量上根本不成比例；在港澳日韓歐美地區，以賦為研究專業者，有如鳳毛麟角。以跨越沉寂與興起之二十年的研究狀況為研究對象，使以後的研究者，能事先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使研究工作能建立在堅實的基

¹ 葉幼明：《辭賦通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頁 248-253。

² 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頁 190。

³ 何新文：〈自成一片風華景象〉，《文學遺產》1991 年第二期，頁 106-109。

礎上，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基礎工作。

二 研究內容、範圍、對象與限制

本研究是以跨越沉寂與興盛之二十年為研究範疇，擬蒐集所有賦的專著與單篇論文，撰述提要，評述其內容，評估其價值，以供學界參考。並就資料所見，略述其發展之趨勢與研究現況。惟楚辭學早已獨立自成一門學問，近年來其研究走向與重點，與賦學差異漸大，其研究成果又十分豐碩，本研究因人力與時間所限，暫且將它排除，以待來茲，所以如以屈賦為題者，都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內。

本研究對有關所有賦的專著與單篇論文之搜集，除借重日本京都大學所編歷年《東洋學文獻類目》之外，大陸地區之資料還依《歷代賦辭典》（遼寧出版社，1992）所附的歷代賦研究論著論文索引，按圖索驥。其篇章除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及清華大學檢索複印之外，更請得北京大學學生及山東大學辭賦研究所師生的幫忙，廣為蒐集。不過因幅員廣大，這些資料又都歷時十年以上，所以掛漏無法避免；即使臺灣的出版品，也會因其浩繁而不免遺珠。不過本研究小組相當盡力，所以在兩岸資料方面，其漏失者應該不至於太多才是。至於將賦文逐譯為外文之作，則不在本研究蒐羅評論的範圍之內。

此外，在1971年之前的資料，雖不在本次研究範圍之內，但為提供更多的資訊，在我們見到的範圍內，順便予以收羅，並為之撰寫提要，主要是提供參考，資料並不完整，為了使討論問題時態度嚴謹，在論題分析及量化統計時，這部分則不予採計。至於日文及英文資料，則由於人力有限，凡原資料蒐集不易者，皆以存目方式處理，尚請諒察。

再者，我們在資料的蒐集上既然無法周全，所以本文所呈現的量化數據，只能作為研判趨勢的參考值，而不要把它當作評鑑成果的絕對值，這是必須在此先加以說明的。

三 研究資料之量化分析

今所蒐見的期刊論文（含存目）計 646 篇⁴，其中不乏不合學術論文規格之篇章，因為有關學術論文之規範各家要求寬嚴不一，本研究為避免過於主觀而掛漏太多，所以從寬認定。至於地區之計量，以考察各地區賦學研究風氣為主，因此以提供出版機會的出版地為計量基準，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康達維教授，雖為美籍人士，但他在《文史哲》發表的論文，則計入大陸地區；又如香港大學何沛雄教授，其在大陸期刊發表者，則計入大陸地區，在臺灣出版者，則計入臺灣地區。今表列如下：⁷¹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臺灣	2	6	4	10	4	14	6	6	4	3	7		9	7	11	3	7	7	6	4
大陸					1	2	1	2	6	23	15	20	38	24	35	35	41	50	49	68
日本	2	2	1	2	3	2	2	1	2	3	2	1	6	5		4	1		1	1
香港	1		1			1										2				
其他	1					2			1	1	1									

從上表可見：臺灣地區從 1972 年到 1985 年沒有太大的起伏，1985 年之後，可能因期刊的減少，發表園地的壓縮，反而更為式微，不像大陸地區因改革開放，從 1979 年以後，溫和放量上升，難怪葉幼明《辭賦通論》以 1980 年到 1989 年為新賦學的繁榮期。因此，兩岸賦學研究成果的消長極為明顯。至於國外地區，日本是賦學最有成績的國度，但檢索歷年《東洋學文獻類目》便可看出，其成果與其他文類研究相較，根本不成比例。當賦學論題的討論在漢語文學地區都還不成氣候的時期，其研究風氣未開是可以理解的。從表上所見，香港地區篇章極少，其實是何沛雄之作，分散在兩岸發表的緣故。至於專著部分，則如下表：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臺灣				1	1	1	1	1	1	3	1	3	4	2	4	3	1	2	1	2

⁴ 凡文同題分期發表者，以一篇計；發表時間以首次為準。如日本學者淺野通有〈秋風辭考〉在《漢文學會會報》從 1972 年到 1978 年分五次發表，在此算一篇，計入 1972 年；至於馮俊傑〈賦體四論〉，1986 年分四期在《山西師大學報》發表，因各期題目分別標出「賦是『古詩之流』辨」、「賦體的生命要素」、「賦體的藝術淵源」、「賦體的正式形成」，所以實際是四篇論文，所以分別計數。

大陸										1	1		1	2	1	4
歐美	1					2							1			

這二十年間臺灣地區賦學專著之所以遠遠超過大陸地區，除研究起步較早之外，主要還是拜學位論文之賜。在三十二部專著之中，有二十部是博碩士論文，其中十部是由本人指導完成，若加上本人兩部專著，則專著部分與本人有關者，即達一半以上。所以基本上還是很寥落的。

若考其研究的範疇，依總論、先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清⁵，加以區分表列，亦可見眾所屬目的焦點，期刊論文的部分如下：

地區\分期	總論	先秦	兩漢	魏晉六朝	唐宋	元明清
臺灣地區	12	7	54	78	27	
大陸地區	64	20	155	105	67	6
日本	3	1	14	17	5	
香港	1		2	1		
其他地區	1		3	1		1

賦被公認為漢代文學的主流，所以在大陸地區賦學研究開放之後，最具代表性的漢賦，自然成為眾所屬目的焦點，而以文學自覺初期的魏晉六朝賦次之。在臺灣則因強調賦的文學性，便自然對魏晉六朝賦投注較多的關愛。由發表篇章的數質值來看，魏晉六朝和唐宋兩期，篇章約為大陸地區的一半，而兩漢部分竟不及大陸地區的四分之一，即可見其端倪。在日本的情況與臺灣近似。至於專著的部分，情況稍為不同，兩岸都是以兩漢最獲青睞，這可能與較大篇幅的專著，大多從文學史的角度切入有關，其他地區也以集中在兩漢賦的研究。其數量大體如下：

地區\分期	總論	先秦	兩漢	魏晉六朝	唐宋	元明清
台灣地區	6	1	14	8	3	1
大陸地區	2	2	6			
歐美地區			3			

⁵ 乃依發展階段而劃分，有關歷代賦注及賦史之作，皆歸總論；跨越兩個階段，歸於前一階段，如論先秦兩漢，則歸先秦；論漢魏六朝，則歸兩漢；兼括三個階段，則歸總論。

四 研究成果的回顧

(一) 綜觀 1971-1990 年大陸地區賦學研究，就整個風氣而言，由冷而熱，由貶抑到開放，有兩種現象值得敘述：

1.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間或不免冷飯熱炒，或勇於標新立異

凡事物經歷長久的壓抑，在壓力驟然舒解之後，常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賦在長期被抹殺之後，再得到重新檢視的機會，被壓抑的聲音得以舒放，許多厲兵秣馬想尋求著力點以展身手的人，終於找到了揮灑的天地。於是賦學的研究風氣自然蓬勃起來，由本研究所提出的數據，可略知其梗概。如果據朱一清的統計，自 1963 至 1978 十幾年間，沒有論賦之文，僅 1979 至 1983 五年間，各報刊雜誌發表有關漢賦者，就多達四十餘篇，將近 1949 至 1978 二十多年間的論文總數的兩倍。⁶此期間雖然研究視野較為閉塞，但研究隊伍已從化整為零的銷聲匿跡，逐漸如雨後春筍的冒出頭來，成為賦學研究的主力。

以研究賦的源流為例，依張慶利〈近年漢賦研究綜述〉⁷的歸納，即有七種說法，而其所謂多源說，各家又不相同。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於是有徐宗文〈試論古詩之流——賦〉（《安徽大學學報》1986 年第 2 期），認為漢賦直承《詩經》；也延伸出孫堯年〈賦體源流辨駁議〉（《學術月刊》1983 年第 10 期）和傅剛〈賦的來源及其流變〉（《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4 年第 3 期），認定賦是由不入樂的詩發展而來的。

孫堯年的〈賦體源流辨駁議〉是在褚斌杰〈論賦體的起源〉（《文學遺產》增刊 14 輯）之後，並針對李伯敬的〈賦體源流辨〉（《學術月刊》1982 年第 3 期）而發。褚斌杰的〈論賦體的起源〉，認為「賦」此一文學

⁶ 朱一清〈近年漢賦研究綜述〉（《古典文學研究動態》，中華書局，1993，頁 28-39。）原載《文史知識》，1984 年第 12 期。依張慶利〈近年漢賦研究綜述〉（濟南《文史哲》，1989 年第 6 期，頁 102-105）統計，自 1980 至 1988 年，全國發表漢賦研究論文約 180 篇左右。

⁷ 同註 3。

體裁與名稱出現在前，《詩》六義的說法在後，而且賦體作品兼比興之法，所以與詩沒有直接的關係。至於李伯敬的〈賦體源流辨〉，則以荀賦為辭賦之椎輪。李伯敬在孫堯年駁議之後，又發表〈賦體之源不在古詩內部〉（《鎮江師專教學與進修》1984年第4期），對孫堯年提出反駁並再肯定自己的觀點。此外，劉春〈略論漢賦和它的思想性〉（《文科月刊》1987年第4期），也以為漢賦導源於荀賦。康金聲〈漢賦「拓字于楚辭」質疑〉（《山西師大學報》1984年第2期）則以為漢賦主要是源於散文。⁸黃樣興的〈略論戰國策對漢大賦的影響〉（《上饒師專學報》1986年第1期）則以體制及結構、鋪陳、對偶、排比、誇張、音韻等方面，肯定《戰國策》對賦的影響。

駱玉明〈論「不歌而誦謂之賦」〉（《文學遺產》1983年第1期）認為賦是從誦讀方式演變為文體之名；馮俊杰〈賦體四論〉（《山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1-4期）則認為賦是源於鋪陳的表現手法。

綜合前人之說，以為賦本多源的，也不乏其人。以類別分者，如馬積高《賦史》以為騷體賦係由楚歌演變而來，文賦〈子虛〉〈上林〉之類是由諸子問答體和游士的說辭演變而來，詩體賦則由《詩》三百篇演變而來。⁹郭預衡〈漢賦的淵源和流變〉（《克山師專學報》1986年第2期），則以為諷諫之賦是戰國縱橫游說的變種，牢騷之賦是源於屈原的〈離騷〉。以為一體來自多源的，如周學禹〈漢賦淵源管窺〉（《信陽師院學報》1985年第3期），認為漢賦的鋪排淵源於古詩和楚辭，問答淵源於荀賦，而鋪張夸飾又淵源於縱橫言辭。

在三十年代，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9）以為賦體是由民歌發其端；朱光潛《詩論·詩與隱》則提出賦源於民間隱語，這些觀點也在這段時間得到進一步的認定。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1980）依據敦煌俗賦，認為「這種講說和唱誦結合的藝術形式，在秦漢時代可能就叫做賦，是民間的文藝。」漢賦雖吸取前代各種文體的特點，但主要是採取民間賦的形式和技巧。張志岳的〈賦比興本義說——兼論賦體的發展〉（見其《中國文學史論集》）根據「在文學樣式大變化

⁸ 此文收入康金聲《漢賦縱橫》（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18-33。

⁹ 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4-6。

的醞釀過程中，民間文學總是走在前面」的規律，並以文獻資料證明，賦也來自民間。劉斯翰〈賦的溯源〉（《華南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則闡發朱光潛的看法，推論由楚民間隱語，而為楚民間賦（荀賦），再為楚宮廷賦（宋賦），而後為漢賦的演變歷程。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其形成自有其複雜的基因，執其一端，當有所見，亦有所蔽，若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是，終究難有定論。賦的起源，前人論之已多，如今很難跳脫其藩籬，卻在短短十年中，出現林林總總的專文，百家爭鳴之景象，可見一斑。據李生龍估計，八十年代，大陸賦學論文近三百篇，¹⁰其間冷飯熱炒，或標新立異，當然也就在所難免了。

2. 逐漸掙脫意識型態的桎梏，但緊箍咒之餘威仍在，故不免仍披其外衣

近年來，不少大陸辭賦學者，都強調「漢賦研究以前受庸俗社會學的影響」，「近幾年研究者力圖突破這種影響」。¹¹龔克昌的《漢賦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即掙脫意識型態桎梏的第一本專著，牟世金〈從漢人論賦到劉勰論賦〉謂此書「拋棄傳統的看法而對漢賦作全面評論，特別是以文學發展的眼光，充分注意到漢賦的藝術成就，對漢賦的認識，才開始出現一個新局面。」¹²即著眼於此，給予高度的評價。但龔克昌《漢賦研究》的再版說明，仍然津津樂道《東岳論叢》1985年第4期刊登〈漢賦研究的新收穫〉，稱其書「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詳細占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考察漢賦這一複雜的文學現象，從而給予漢賦以一個較公正的評價」。¹³

這現象不免令人想到當漢初崇尚黃老，諸子百家便披上黃老外衣圖謀生存，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各家便以儒家為其保護色。在所謂貫徹百花齊放的思想大解放之後，照理說可以不必再拘泥於馬列思想框框，但我

¹⁰ 見李生龍〈近十年的辭賦研究述評〉，載於《賦學研究論文集》（巴蜀書社，1991），頁324。

¹¹ 見李生龍〈近幾年的漢賦研究〉（《求索》，1988年第6期，頁101-104），本文第一節所引葉幼明《辭賦通論》，同有此說。

¹² 見龔克昌《漢賦研究·再版說明》（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頁1。

¹³ 同註10。

們仍在龔克昌 1988 年《漢賦研究》的再版說明看到以下的一段話：

發表在 1981 年 1 期上的〈論漢賦〉，這篇文章是在“四人幫”垮台後不久起草的，當時百家爭鳴的空氣還尚未真正形成，所以我想說的話有的欲說還休。如第一部分談諷諫問題，最後特留下一句話：“對這個問題，我將作進一步考慮。”又如最後一段談“文學的自覺時代”，提出這個時代應在西漢前期，比魯迅提出的曹魏時期早三百五十年。但這段文字寫了又刪，刪了又寫，寫了再刪，反複多次。最後是在看清樣時才又壯大膽子加進去的。由此可見，這篇論文的一些觀點並非我當時真實的看法，文章還時為周圍環境所左右。現也作為附錄收進去，以為我們今日這個自由爭鳴的學術空氣來之不易的見證。

14

看來思想緊箍咒之餘威仍在，論賦時仍多所顧忌。近十年來，大陸學者面對漢大賦的評價時，仍充滿意識型態和階級仇恨的字眼，所謂勞動人民的鬥爭、美化統治階級的罪惡、填補統治者精神空虛的御用文學、機械陳說的儒家教條、我國文學發展長河中的一段不光彩的歷史等，不一而足。¹⁵李生龍《近十年的辭賦研究述評》雖抨擊這種態度，但他竟然是藉著強調「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來指導自己的研究」來批駁，呼籲研究者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¹⁶。何新文的《中國賦論史稿》（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完成於所謂「百家爭鳴的空氣真正形成」之後，並參閱海外賦論，視野已相當開擴，仍然在緒論說：「現當代的賦學研究，在批判繼承傳統方法的基礎之上，用現代科學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廣度和新的角度進行探討研究，取得了嶄新的豐碩成果。」仍見緊箍咒之餘威，披意識形態外衣的現象，一時之間恐怕難以完全破除。本人於 1998 年第四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也提出類似的批評¹⁷，當時有若干大陸學者辯稱：他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辯證

¹⁴ 同註 10，頁 2。

¹⁵ 見朱一清〈近年漢賦研究綜述〉。

¹⁶ 同註 8，頁 330。

¹⁷ 第四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於 1998 年 10 月 22 日至 25 日在南京舉行，本人提出〈1991-1995 年中外賦學研究述評〉，載入《辭賦文學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其實就是指現代科學實證的方法，這還是令人感受到當漢初崇尚黃老，諸子百家便披上黃老外衣圖謀生存，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各家便以儒家為其保護色的氛圍。

（二）1971-1990 年中國大陸以外地區賦學研究，風氣未開，只見寂寞的鬥士身影

當中國大陸地區賦學沉寂的時候，在港澳臺灣亞太歐美地區，以賦為研究專業者，也如鳳毛麟角。在日本早年有鈴木虎雄的《賦史大要》（1935）之作，接著在 1963 年有中島千秋的《賦的成立及展開》，完成在中國大陸地區賦學沉寂的時期，為賦學界的佼佼者，但這二十年似無後繼者。

香港何沛雄則為賦學名家，他在 1982 年出版《讀賦零拾》（收入《賦話六種》香港出版），1986 年出版《漢魏六朝賦論略》（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出版《漢魏六朝賦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用力甚深。

美國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在賦學界最負盛名，1976 年出版《The Han Rhapsody: A Study of Yang Hsiung》（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其後續有論文發表，並將《昭明文選》譯為英文，外文譯注賦篇之多，恐難有出其右者。

在臺灣本人於 1975 年完成《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博士論文），1980 年出版《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從 1979 年到 1990 年指導賦學方面博碩士學位論文 10 篇。

由於這些人都起步於中國大陸賦學的沈寂期，賦學研究風氣未開，所以這時期不論何地，著力於此一領域者，看到的總是踽踽獨行的身影。

五 客觀廣深的研究趨勢

(一) 研究態度趨於客觀，研究視野趨於寬廣，也漸能從小處著眼

李生龍〈近幾年的漢賦研究〉（《求索》，1988年第6期）指出1984年以後，漢賦研究有五方面的變化：第一、對漢賦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進行肯定的人多了，完全否定它的文章已不再出現；第二、在肯定漢大賦的同時，很多研究者還深入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它在思想藝術上的不足與缺陷；第三、從研究視野來看，人們對漢賦的考察遠比以前寬闊；第四、從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來看，也出現一些可喜的探索；第五、對漢賦作家與作品的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果。¹⁸

李生龍所說的前兩點，說明研究者的態度趨於客觀，他舉馬積高《賦史》指陳漢賦缺乏批判的勇氣；尉天驕〈“恐龍”的笨拙——對李澤厚論漢賦的不同意見〉（《南京大學研究生學報》1987年第1期），則從美學思想發展進程的角度來評斷漢賦，認為漢大賦「以大為美」帶有拘謹性與保守性的觀念，是屬於藝術的初期階段，批評了李澤厚的看法。¹⁹姑不論其是非，確已見其擺落舊說或權威，作多元觀照的努力。

其實，研究者擺脫權威的籠罩，態度趨於客觀，也可以從宋玉賦的研究見其端倪。早期陸侃如《宋玉評傳》、劉大白《宋玉賦辨偽》等，認為除了〈九辯〉和〈招魂〉外，十篇宋玉賦都是後人的偽託，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敘宋玉只取〈九辯〉，游國恩除在《楚辭概論》大力刪削宋玉賦的著作權外，並在與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合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斬釘截鐵地說：「宋玉作品流傳下來的只有〈九辯〉一篇。」早先似已成不移之論。但近來已完全鬆動了，曹明綱的〈宋玉賦真偽辨〉（《上海師院學報》1984年第2期）列舉七條理由作為「《文選》所收宋

¹⁸ 同註9。

¹⁹ 見李生龍〈近幾年的漢賦研究〉。依《歷代賦辭典》所附歷代賦研究論著論文索引，則載《淮北煤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

玉五賦不僞的主要依據」，1987年馬積高的《賦史》也從三方面認定《文選》所收〈風賦〉、〈高唐賦〉、〈神女賦〉和〈登徒子好色賦〉不僞。除《文選》所題錄的之外，龔維英的〈宋玉作〈招隱士〉考辨〉（《江漢論壇》1986年第3期），成績的〈從曾侯乙墓的竹笛看宋玉〈笛賦〉的真實性〉（《江漢論壇》1986年第7期），則又論證宋玉〈招隱士〉與〈笛賦〉的真實性，都直接挑戰了權威。

至於視野的寬闊，李生龍所指的是《賦史》和《漢賦研究》的全面觀照和系統研究，以及以往較忽視的範疇，已被注意。二書的問世，這當然是賦學界的大事。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像葉幼明和何新文，他們能注意到大陸以外地區的研究成果，²⁰以及李生龍〈近幾年的漢賦研究〉對研究方法有所措意，都是在視野方面值得稱道的。

賦家及其個別作品之被重視，是賦學興盛及其學術人口增多之後的必然現象，在許多園地已被耕耘之後，後出者也只有從小處著眼，再加以深化。這一類的研究對賦的演化等大問題的解決，有很大的幫助。如程毅中的〈敦煌俗賦的淵源及其與變文的關係〉（《文學遺產》1989年第1期）便是從俗賦探究文學史的重大問題，而有新的詮釋。

在所謂百家爭鳴思想大解放之後，研究態度趨於客觀，研究視野趨於寬廣，並能從小處著眼，其所締造的成果，從《歷代賦辭典》（遼寧出版社，1992）所附的歷代賦研究論著論文索引，即可見其梗概。

（二）借新出土之資料開拓新領域，重新檢視賦史之發展

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初年一號墓，出土大批竹簡，除發現《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先秦古籍外，還發現唐勒賦的殘簡。1985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第壹冊，稱之為唐勒宋玉論馭賦，疑其為宋玉賦佚篇，當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11輯，刊載羅福頤的〈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稱首簡（0184號）背面上端有「唐革」二字，根據《詩·斯干》「如鳥斯革」，「革」字《韓

²⁰ 葉幼明《辭賦通論》和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對港臺以及美國的研究成果，都有專節討論。

詩)作「勒」的事實，釋爲唐勒。同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吳九龍的《銀雀山漢簡釋文》，附分類索引，則唐勒賦有26支簡，計231個字。

這些新出土的資料爲賦的研究展開新頁，湯漳平〈論唐勒賦殘簡〉將吳九龍所錄，選18簡以意排序²¹。譚家健〈唐勒賦殘篇考釋及其他〉(《文學遺產》1990年第2期)，除考釋殘簡文字外，還論其所呈現之思想與《淮南子·覽冥訓》最爲近似，更從其形式，參酌其他考古資料及先秦古籍，爲近年來宋玉賦著作權之被剝奪，予以平反。這些研究對賦史發展之重新檢視，將有極大的助益。但《銀雀山漢墓竹簡》第貳冊第參冊尙未出版，否則可依竹簡照片，得到更多的訊息，對唐勒以及先秦賦的了解，將更爲有利。

(三) 選注方興未艾，專著如雨後春筍，散兵游勇漸成隊伍

近年來，在大陸地區以鑑賞辭典爲名，以選篇譯注爲實的書，數量相當多。於是《古文鑒賞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古文鑒賞大辭典》(徐中玉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以至1990年以後的《中國雜文鑑賞辭典》(樓瀟光、來克讓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還有《昭明文選譯注》(陳宏天、趙福海、陳復興主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及1988)，²²《古文觀止新編》(錢伯城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等，都譯注了不少賦篇。至於《歷代辭賦鑒賞辭典》(霍旭東、趙呈元、阿芷主編，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和《歷代賦辭典》(遲文浚、許志剛、宋緒連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全是賦篇譯注，更不在話下。

賦的選注專書，在早先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4)之後，從1983年起出版不少，如裴晉南等的《漢魏六朝賦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劉禎祥、李方晨的《歷代辭賦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李暉、于非的《歷代賦譯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張永鑫的《漢魏六朝小賦選》(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黃瑞云

²¹ 《文物》1990年第4期。

²² 《昭明文選譯注》，陳宏天、趙福海、陳復興主編，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共四冊，第一、二冊全爲賦篇，分別出版於1987及1988，第三、四冊出版於1992年。